

鼓浪屿研究

第七辑

Journal of Gulangyu Studies, Vol. 7

主 编 何瑞福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鼓浪屿研究

第七辑

Journal of Gulangyu Studies, Vol.7

主 编 何瑞福

厦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厦门市社会科学院
合 编

鼓浪屿国际研究中心
主 办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鼓浪屿研究. 第七辑/何瑞福主编.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7-5615-6760-9

I. ①鼓… II. ①何…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58230 号

出 版 人 蒋东明

责任编辑 许红兵 章木良

封面设计 李嘉彬

技术编辑 朱 楷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编 办 0592-2182177 0592-2181406(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ress@126.com

印 刷 厦门市万美兴印刷设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257 千字

印数 1~1 000 册

版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目 录

一

1	[匈牙利]洪思明	东西方视域的鼓浪屿公共租界语言文化交流研究
46	钱 毅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鼓浪屿早期的华侨洋楼建筑
64	陈娟英 陈斯蓓	鼓浪屿:文物见证多个族群交融汇聚

二

81	谢 泳	厦门旧笔记五种
87	蔡文田 龚万钟	“五绝”名士龚植及其家族史语
95	吴永奇	许葆栋与刘寿祺 ——奋战在厦门抗日战线的两位鼓浪屿名医
105	何书彬	余青松:创办紫金山天文台的鼓浪屿人
112	龚 洁	中国海洋科学先驱唐世凤的鼓浪屿情结
119	郭 满	故国遗梦:一场“岛”“屿”的邂逅 ——20 世纪前十年台湾作家赖和笔下的鼓浪屿

三

137	[美]理清莲撰 戴兆璋 叶克豪译	厦门女子学校梗概 ——为纪念建校五十周年而作
143	吴光辉 郭立欣	司马辽太郎的《厦门游记》
145	[日]司马辽太郎撰 郭立欣译	梦之厦门
150	[日]司马辽太郎撰 郭立欣译	厦门两天

四

154	蔡望怀	厦门市音乐学校及厦门爱乐乐团的创办历程 ——《鼓浪屿往事》专访厦门市政协原主席蔡望怀先生
158	吕 舟	国家历史身份的载体:中国世界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与挑战 ——鼓浪屿申遗成功之反思

东西方视域的鼓浪屿公共租界语言文化交流研究

[匈牙利]洪思明*

摘要:鼓浪屿公共租界(1903—1945)是除上海公共租界以外,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另一个大型公共租界。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二战结束,鼓浪屿作为中外语言文化交流的热点区域之一,以其特殊历史背景和历史贡献,于2017年7月8日被联合国宣布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本论文的研究目标是介绍外国人和华人在鼓浪屿语言文化交流中的历史贡献和影响,鼓浪屿在现当代中外语言文化交流中的角色,及其对南海地区语言文化的影响。最近几十年大量中文和少量外文学术著作讨论了鼓浪屿的历史,它们大部分是以英美传教士活动为主,而且地理范围限于鼓浪屿和厦门。本论文的创新之处,一是通过用英文以外的其他外文资料(如西班牙文)讨论其他国家和鼓浪屿的关系。二是通过分析当时在台湾和东南亚出版的一些英文、日文和荷兰文闽南话字典,介绍鼓浪屿语言文化交流对南海地区语言文化的影响。

本论文的结论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根据查询到的资料,认为在外国人对鼓浪屿语言文化交流的贡献中,英美基督新教传教士是比较晚近的,而以西班牙天主教传教士为主的其他国家的人是较早的;第二部分认为在华人对鼓浪屿语言文化交流的贡献中,主体是本地人和从东南亚返回厦门的华侨;第三部分通过对华人和外国人的贡献进行比较,认为主要的差别是外国人在鼓浪屿上的语言文化活动以传教为目的,力图创造一种罗马拼音文字来作为闽南话书面语,以便把基督教经书等文献翻译成闽南话,从而在本地顺利传教。华人的贡献则和当代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现代化运动有关,特别是和语文改革运动有关。

关键词:鼓浪屿;公共租界;白话字

一、绪论

虽然鼓浪屿公共租界(Gulangyu Joint Concession)正式建立于1903年,但是外国人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已经开始定居在岛上,并且到了19世纪70年代鼓浪屿实际上是由外国人控制的。因此,本论文研讨的时间范围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结束,包括从外国人首次定居在鼓浪屿上到中国收回鼓浪屿公共租界这中间的整个时期。本论文里面也提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外国人在厦门的活动(例如西班牙传教士们在郑成功控制下的厦门的

* [匈牙利]洪思明(Sebestyén Hompot):根特大学 根特 比利时

活动),以及17世纪驻菲律宾的西班牙传教士编纂的闽南话词典,不过这些交流活动不属于本论文里面讨论的语言文化交流过程。本论文致力于探讨鼓浪屿在语言文化交流中的中心作用,因为鼓浪屿的历史和厦门岛的历史有密切关系,其地理范围并不完全限于鼓浪屿本身,因此本论文还讨论了不少在厦门岛出现的相关事件。本论文主要从语言学方面讨论语言文化交流,主要参考资料为本时期中国和外国作者编纂的闽南话词典和课本。本论文的目的是通过这些书籍介绍当时在鼓浪屿上的历史和语言文化史实,探讨中国和外国作者编辑闽南话词典和课本,创制闽南话拼音方案的不同动机。通过参考当时在鼓浪屿以外南海地区出版的闽南话资料,本论文也致力于求证鼓浪屿语言文化交流进程对南海地区语言文化的影响。

本论文里面使用的参考书大部分是用中文和英文写的,此外包括少数日文、西班牙文、荷兰文和闽南话(白话字)书籍。因为最后几十年讨论鼓浪屿的中文资料比较多,所以大部分第二手资料是中文书籍。第一手中文资料包括当时中国作者编写的书籍和收集于《鼓浪屿文史资料》《厦门文史资料》的资料。所使用的第一手英文资料包括当时英美传教士编写的介绍厦门和周围情况的论著,以及当时传教士编纂的闽南话课本和词典。因为在中国以外鼓浪屿的研究还不算有特别多的成果,讨论厦门和鼓浪屿租界历史的外文资料仅仅限于一些英文和西班牙文学术论文(后者包括不少来自17世纪西班牙文第一手资料的引文)。此外还有当时出版的用日文、荷兰文和闽南白话字出版的闽南话词典和课本,也可以算作第一手外文资料。

二、文献综述

这部分介绍鼓浪屿研究至今的发展,列举至今关于鼓浪屿研究的资料。首先列举中文资料,之后是英文资料,最后是西班牙文资料。

从1963年到2002年,政协厦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写出版的《厦门文史资料》一共23辑,其中第16辑《厦门的租界》^①(1990)主要介绍鼓浪屿公共租界的历史,包括当时在鼓浪屿建立的学校、教会等教育和文化机构的目录。从1995年到2003年,政协厦门市鼓浪屿区委员会出版的《鼓浪屿文史资料》一共10辑(2010年由鼓浪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系列丛书编委会再版)^②,包括大量关系到鼓浪屿公共租界历史的第一手叙述和报告,大大促进了对鼓浪屿的专门研究。其中研究语言文化交流方面值得提到的文章有:邱承忠《中国拼音文字运动的先驱——卢懋章》(第3辑,1998)、张宗诒《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厦门的社会文化活动》(第5辑,2000)以及《为厦门大学奠定基石的林文庆校长》(第6辑,2001)、周长楫《我所知道的周辨明教授》(第6辑,2001)、朱质《解放前鼓浪屿的教育概况》(第9辑,2002),等等。

历史学家何其颖的《公共租界鼓浪屿与近代厦门的发展》(2007)是对鼓浪屿公共租界历

① 陈纹藻.厦门文史资料第16辑:厦门的租界[M].厦门:政协厦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0.

② 郑惠生,江韵兰.鼓浪屿文史资料[M].厦门:鼓浪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系列丛书编委会,2010.

史、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概括。在本书中何其颖一方面强调鸦片和华工贸易等其他外国人推动的活动对本地社会所造成的损害和本地人反对外国统治的活动,另一方面指出外国人在岛上建立的近代教育机构推动了近代思想的传播。

鼓浪屿研究的近期成果是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鼓浪屿文化历史系列”。该丛书一共包括10辑,其中和语言文化交流相关的有:何丙仲著《鼓浪屿公共租界》(2010),洪卜仁、詹朝霞著《鼓浪屿学者》(2011),苏西著《鼓浪屿宗教》(2011),许十方、陈峰著《鼓浪屿教育》(2012)。《鼓浪屿公共租界》是对鼓浪屿公共租界历史的概括,何丙仲是最近几十年使用大量第一手英文资料介绍鼓浪屿历史的中国学者,例如他本人翻译的《厦门纵横:一个中国首批开埠城市的史事》(美国传教士毕腓力著,原书出版于1911年,中文版出版于2009年)。除了何丙仲著的《鼓浪屿公共租界》,本丛书的另外9辑都是专门探讨鼓浪屿历史的一个方面。《鼓浪屿学者》论述了包括在鼓浪屿上成长或者对鼓浪屿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中国学者的史略,其中从语言文化交流方面来看,在语文改革运动中充当了重要角色的两位语言学家是卢懋章和周辨明。苏西在《鼓浪屿宗教》中指出虽然不同外国传教会对鼓浪屿发展有特别大的影响,可是中国传统宗教,即佛教、道教和民间宗教(特别是本地的妈祖和保生大帝的崇拜)并没有减弱其在本地人中的影响,这些中国传统宗教寺庙在岛上和外国人建立的基督教堂并存。《鼓浪屿教育》论述了包括在岛上建立的不同学校的校史,介绍外国人和华侨对近代教育传播的贡献。其中“鼓浪屿的外语教育:积淀与创新”一章指出英文教育在岛上的普遍性,大量从外国输入的教科书当时在岛上通用。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和厦门市社科院于2015年推出《鼓浪屿研究》,目的是收集关于鼓浪屿研究的最新成就。其中也有在厦门大学做出过研究的外国学者例如Manuel Rigger和David Woodbridge写的学位论文的一些部分(这两篇论文的内容以后讨论)。值得提到的另外一些文章是:王海《战前日本在厦人口状况(1926—1937年)》(第1辑,2015),该文章以在日本档案馆找到的资料为依据,介绍在鼓浪屿上的日本人、日籍台湾人和其他外籍人口状况;何书彬《“闽侨救乡运动”:鼓浪屿归侨精英的一次社会改良梦》(第1辑,2015),介绍以鼓浪屿为中心的华侨现代化运动的历史;英国传教士麦高温(John Macgowan)介绍当时厦门的*Beside the Bamboo*(1914)的中文翻译版《竹树脚下》(第1辑,2015,詹朝霞译,鲁西奇审);英国外交家和语言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著的*A Short History of Koolangsu*(1878)的中文翻译版《鼓浪屿简史》(第1辑,2015,何丙仲译);洪思明《汉语拼音化与鼓浪屿关系初探》^①(第3辑,2015);詹朝霞《马约翰(John Macgowan)笔下的晚清厦门——以“竹树脚下”与“华南记胜之厦门篇”为视点》(第3辑,2015);王海《台湾总督府的南中国经营——以鼓浪屿日本人小学校为例》(第4辑,2016),介绍日本对当时厦门和鼓浪屿教育的影响,指出在厦门日本人所建立的学校以在台湾建立的为模范;洪思明《鼓浪屿天主教史初探》^②(第5辑,2016)。

讨论鼓浪屿历史的第二手外文资料限于一些英文学位论文。其中被中国学者忽视的是James Alexander Cook(詹姆斯·亚历山大·库克)1998年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发表的博

① 洪思明.汉语拼音化与鼓浪屿关系初探[M]//鼓浪屿研究(第三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82-89.

② 洪思明.鼓浪屿天主教史初探[M]//鼓浪屿研究(第五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45-49.

士论文“Bridges to Modernity: Xiamen, Overseas Chinese and Southeast Coastal Modernization, 1843—1937”(《现代性的桥梁: 厦门、华侨和东南沿海地区的现代化, 1843—1937年》^①)。本论文长达460页左右, 详细地分析厦门现代化和华侨的关系, 其中一章专攻鼓浪屿公共租界和华侨的关系。其参考资料包括作者在美国和中国档案馆找到的资料和当时由新加坡、马六甲、檳城华侨作者出版的有关厦门的著作。作者指出厦门从郑成功家族统治时期开始成为东南亚华人移民的主要出发地之一, 而该移民过程不是晚至19世纪西方殖民地的扩展才开始。此外, 以陈嘉庚、林文庆等著名华侨知识分子的著作为依据, 作者指出20世纪初期归侨的思想一方面在东南亚殖民地受到了西方国家的科技和文化影响, 另一方面因为华侨在当地社会中作为少数民族, 他们的政治自我实现愿望被西方殖民当局阻碍, 因此使得不少华侨成为中国爱国主义的热心支持者, 形成了一种对西方道德观持批评态度的儒教复兴运动(“Confucian Revivalism”)。由于他们在西方殖民地通过学习吸收了西方语言、科技和教育知识, 以致到了20世纪前期, 归侨对鼓浪屿、厦门, 甚至整个闽南地区的现代化做出了特别突出的贡献。在专门探讨鼓浪屿的一章里面, 作者指出, 由于大陆政治形势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不稳定, 大多数回到厦门的华侨定居在外国人管辖下的鼓浪屿, 因此鼓浪屿成为不同华侨现代化运动的中心地。在结语里面作者指出除了本地人口和外国人口以外, 华侨在租界时期厦门和鼓浪屿出现的语言文化交流过程中的重要性, 强调华侨对传播近代教育文化做出的贡献。

另外一份有价值的第二手英文资料是厦门大学奥地利校友Manuel Rigger于2015年提交的硕士论文“German Involvement in Xiamen After the First Opium War, 1842—1917”(《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德国对厦门的影响(1842—1917)》)。Rigger先生的硕士论文基于他在德国不同档案馆收集的, 涉及租界时期厦门的第一手资料。他指出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一直到1891年青岛胶州湾德国租界的成立, 这段时间德国当局考虑了在厦门成立德国专门租界的可能性, 然而此后厦门变为了他们认为的次要的地方。虽然德国也是1903年在鼓浪屿建立了公共租界的国家之一, 并且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而战败, 其在中国的所有属地在鼓浪屿都有领事代表, 可是德国的国际影响总体上不如英国、美国和日本等。虽然当时在厦门有一些成功的德国贸易公司, 可是按照作者的调研, 除了一座于1875年在厦门岛建立的公共图书馆以外就再没有任何其他德国人建设和管理的文化遗存了, 没有宗教和教育机构, 也没有在当地常驻的德国传教士。该论文的主要论点是德国在厦门只在航运工业方面有比较大的影响, 因为厦门成为德国航运公司在东亚地区经营的主要口岸之一。

英国籍厦门大学博士后研究生David Woodbridge在厦门和英国档案馆研究过有关租界时期厦门的资料, 编写了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Britain in Xiamen: Aspects of Treaty Port History”(《在厦门发现不列颠: 条约口岸史研究》)。该报告包括大量在英国档案馆找到的17世纪和20世纪30年代中间形成的第一手资料的引文。作者所找到的最早档案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和郑氏当局之间的通信, 该档案证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郑氏时期已经在厦门建立了商埠。之后发表的档案证明一直到清朝实行海禁政策, 英国在厦门都一直有在经营, 但是之后其经营限于广州,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再在厦门开设商埠。按照第一次鸦片战争之

① Cook, James Alexander. *Bridges to modernity: Xiamen, overseas Chinese, and southeast coastal modernization, 1843—1937* [D]. San Dieg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8.

后的英国资料,可知当时鼓浪屿的人口密度比厦门岛小得多,卫生条件也比厦门岛好,因此从一开始大部分到达厦门的外国人把鼓浪屿选为定居的目的地。该报告还包括大量在厦门经营的英国公司和驻华英国外交使团之间的通信,特别是关系到20世纪20年代反殖民主义抗议运动的档案。按这些资料,作者指出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厦门的英国商人由于害怕反殖民主义抗议运动对自己产业的损害,促使英国外交使团允许驻鼓浪屿华人政治权力的扩展,结果就是促成了1926年《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的修正,例如工部局的7名会员当中,华人人数从1名升到3名。

对西班牙天主教在厦门的历史来说,西班牙研究者 Anna Busquets Alemany 所著的“Los frailes de Koxinga”(《郑成功的修士们》,2007)值得提及。该文章是2006年由多个西班牙大学共同开展的“亚太地区在西班牙的研究”(La investigación sobre Asia y el Pacífico en España)项目的一部分。^① 该项目也包括1555年和1900年关系到中国的西班牙文档案的数字化和网上出版(China en España-Elaboración de un corpus digitalizado de documentos españoles sobre China de 1555 a 1900,“中国在西班牙——创造从1555年到1900年关于中国出版的西班牙语档案的数字语料库”)。^② 至今已经实现了16世纪和17世纪档案的数字化。Alemany女士所著文章的内容基于3篇17世纪来华西班牙传教士的报告,其中一名和郑成功有过接触。该报告证明西班牙多明我会已经在郑成功家族统治下的厦门开设教堂和参与传教活动。西班牙多明我会在厦门的活动和该教会在当时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的活动有密切关系。因为菲律宾华侨人口大部分是从漳州和泉州移民来的,当地的多明我会传教士已经于17世纪初编辑了一些闽南话课本,这些手稿算是闽南话和西方语言之间交流的最早例证。德国汉学家 Henning Klöter(中文名为韩可龙)专门研究这些早期西班牙传教士编辑的闽南话课本,他著的两篇英文文章是:The Chinese Language Through the Eyes of Western Missionaries: A Hokkien Grammar of the 17th Century(《西方传教士眼中的中文:17世纪出版的一本闽南话语法书》)^③和 The Language of the Sangleys: A Chinese Vernacular in Missionary Source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常来人^④说的语言:17世纪传教士编写的档案里面的华人土话》)^⑤,后者作为韩可龙著的,2010年由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出版的同名书的一部分。韩可龙指出,有一些手稿的出版年份不明,但因为和利玛窦著《葡汉辞典》差不多,有可能不只是作为闽南话罗马字化的例证,而是所有汉语方言罗马字化的最早例证。和韩可龙的研究工作有关的是台湾语言学家洪惟仁2013年发表的中文在线文章(复旦大学中西语言接触系列研究 workshop 报告)《十六、十七世纪之间吕宋的漳州方

① [2017-03-10].<http://www.ugr.es/~feiap/ceiap1/ceiap/ceiap1.pdf>.

② [2017-10-03].<https://www.upf.edu/asia/projectes/che/principal.htm>.

③ Klöter, Henn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through the eyes of western missionaries [EB/OL]. [2017-03-10].http://www.academia.edu/8847636/The_Chinese_language_through_the_eyes_of_Western_missionaries_A_Hokkien_grammar_of_the_17th_century.

④ 常来人:英文为 Sangleys, 参考到菲律宾华侨,按照最广泛接受的理论,其来自闽南话 seng-lí-lâng(生理人),意思是指“生意人”。

⑤ Klöter, Henning. The language of the Sangleys: A Chinese vernacular in missionary source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EB/OL]. [2017-03-10].http://www.academia.edu/8847355/The_Language_of_the_Sangleys_A_Chinese_vernacular_in_missionary_sources_of_the_seventeenth_century.

言》。

本论文有两个主要贡献。首先,本论文收集了最后几十年的关于鼓浪屿的用中文和外文出版的所有学术资料。其中分析和概括了《鼓浪屿文史资料》系列,“鼓浪屿历史文化系列”,何其颖等所著的中文资料,在厦门大学发表的一些英文硕士论文和研究报告,在网上找到的一些英文和西班牙文学术资料和鼓浪屿语言文化交流有关的内容。其次,在厦门大学图书馆各分馆和网上探寻了所有从来没有人研究过的和鼓浪屿语言文化交流有关的资料,特别是当时在台湾和东南亚出版的英文、日文和荷兰文闽南话课本和字典,指出了鼓浪屿语言文化交流对整个南海地区的影响。

三、鼓浪屿公共租界简史

(一)鼓浪屿公共租界的建立过程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厦门成为最早被列强打开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中国收回所有外国租界的时候,在厦门存在的租界有两个:位于厦门岛的英国专管租界(英租界)和位于鼓浪屿的公共租界。虽然外国人在厦门的定居、商业和传教的活动开始于鸦片战争,可是英租界的正式开辟出现于1861年。对鼓浪屿来说,虽然该岛从18世纪40年代开始作为厦门的主要外来人口居留地,但是一直到1903年鼓浪屿公共租界才开辟。直到20世纪初期厦门英租界主要作为外国人的贸易区域,而鼓浪屿主要作为外国人的居留区域,不少外国侨民白天渡海到英租界去处理业务,晚上再渡海回家休息。日本占领台湾以后,因为茶叶贸易的中心从厦门移到台湾,英租界越来越失去了其重要性,甚至于1930年英国把该租界退还给中国,此时鼓浪屿公共租界变为厦门的唯一外国租界。^①

在鼓浪屿公共租界的历史上,一共有13个国家在岛上有名义上的领事机构。这些国家岛上领事馆的开馆时间如下:英国(1844)、美国(办事处设立于1844年,领事馆开馆于1865年)、西班牙(19世纪50年代前后)、法国(1860)、德国(1870)、日本(1875)、荷兰(从1852年英国任其在鼓浪屿的领事)、比利时(1890),另外5个国家(丹麦、挪威、瑞典、奥匈帝国、葡萄牙)的领事大部分由别国领事代理。^②

在岛上有独立领事馆的各国,对鼓浪屿发展的全面影响程度却有较大的差别。早期,鸦片战争中占领厦门港和鼓浪屿的英国占有优势地位。从20世纪末开始在南海地区扩张的两个新殖民大国,美国和日本,在鼓浪屿上的影响也迅速地增强。《马关条约》订立后占领台湾的日本帝国政府把闽南地区视为“南进”扩张主义政策的下一目的地。1902年美国占领了从16世纪直到1898年被西班牙统治的菲律宾,并且从此越来越关心日本在南海地区的扩张,力图限制日本的影响。从各国来看,除了英、美、日三个国家以外,其他国家对鼓浪屿发展的影响不算太大,只是限于一些特定的领域。Manuel Rigger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德

① 费成康.中国租界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292-297.

② 何其颖.公共租界鼓浪屿与近代厦门的发展[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8-19.(参考资料:厦门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厦门文史资料:第3辑[M].厦门:厦门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0:8-9;厦门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厦门文史资料:第16辑,厦门:鹭江出版社,1990)

国对厦门的影响(1842—1917)》根据当时德国外交家的通信资料,详细地分析了德国在厦门和鼓浪屿上的影响,德国的外交家们虽然在19世纪70年代前后考虑过管辖鼓浪屿,并且建立了该岛上的德国专管租界,可是最后德国还是把青岛的胶州湾选为德国在华活动的中心,而在鼓浪屿上的大部分活动限于航海和商业。^① 1899年1月日本驻厦领事向厦门道台提交了日本的地区划分要求,将厦门岛的一大片土地和鼓浪屿的三分之一划给日本作为专管租界。趁着清政府对付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机会,日本领事暗地支持日本僧侣于1900年8月23日深夜纵火焚烧厦门山仔顶的叫作东本愿寺的日本佛庙,然后以该事件为借口命令“和泉号”军舰派遣陆战队登陆。随后英、美海军做出反应,于29日和31日把多艘军舰开到厦门。在此形势之下,日本终于在31日撤走战舰与军队。日本的这种野心伤害了在鼓浪屿上的其他国家的利益,使得美国领事巴詹声(Burlingame Johnson)提交了把鼓浪屿作为公共租界的计划。清政府和各国领事商谈建立公共租界的议题以后,为了利用英、美两国的势力阻止日本在华南的扩张,同意建立鼓浪屿公共租界。到1902年11月拟定了建立公共租界的文件《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并且于1903年1月成立了鼓浪屿公共租界的工部局,5月1日进行行政管理。^②

(二)鼓浪屿上的行政管理体制

公共租界建立以前鼓浪屿不算是中国法律管辖以外的外国租界,只算是所谓“外国人居留地”。按照费成康的定义,外国人居留地是“通商口岸中尚未发展成租界,但外人已拥有一定特权的居留、贸易区域”^③。1886年鼓浪屿的外国人公然无视清政府地方当局,组织了一个“鼓浪屿道路墓地基金委员会”(Kulangsu Road and Cemetery Fund),之后该委员会向岛上居民收取每年的人头税、马匹税、车辆税、坟地税等,并且管理修整马路和洋人公墓、开水沟、立路灯等工作。

鼓浪屿的所谓“公共租界”政治地位以及行政制度基于上海公共租界的模式。该称谓的意思是不要作为一个国家专管的租界,而且属于几个不同国家的公共管辖区域。除了上海和鼓浪屿以外,中国没有其他地方有这种特殊租界。按照上海的模式,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机构的英文名字是Municipal Council(“市政会”),但是中文一般称“工部局”。《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的前言这样定义工部局的功能:“鼓浪屿作为公共地界,内有应添筑修理新旧码头、道路,设立路灯、需水通沟,设立巡捕,创立卫生章程。”意思是工部局需要管理公共租界的三种要务:城市建设、治安和环境卫生。工部局的领导部门是董事会,其7名成员中1名由兴泉永道台指派,另外6名由洋人纳税者会于每年年初召开的“常年公会”选举担任。因为从20世纪初开始,岛上的华人、华侨人口的影响越来越大,1926年洋董事的人数由6名减少为4名,华人董事由1名增加到3名。董事会领导下的行政机构权力最大的人,即工部局董事会的秘书,中国人称之为“局长”,局长由董事会聘请,并向董事会负责。在其40年的历史中,公共租界的所有局长都是英国籍的,且都是军人出身。成立初期的工部局仅设有办公处和巡捕房,全局总计38个人,分为4队(巡捕队、修路队、清路队、清洁队)。为了强化统

① Rigger, Manuel. German involvement in Xiamen after the First Opium War, 1842—1917 [M].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2015: 116-120.

② 何其颖. 公共租界鼓浪屿与近代厦门的发展[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7: 19-31.

③ 费成康. 中国租界史[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0: 326.

治,工部局下属的办公处和巡捕房的人员其后不断增加,组织系统有三次改变。^①

四、外国人对鼓浪屿语言文化交流的贡献

(一)英美基督新教传教士对鼓浪屿语言文化交流的贡献

1. 英文闽南话语言交流在东南亚的开端

按照 David Woodbridge 在英国档案馆找到的涉及厦门的资料,英国人在厦门的活动始于郑成功家族统治时期,英国东印度公司于 1677 年开设了第一个商埠。1680 年郑成功的军队后撤到台湾时打劫了英国东印度公司,1684 年得到清朝当局的经营允许,之后一直经营到 1757 年。从 1757 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朝的海禁政策下外国贸易活动仅限于广州。可是根据美国传教士毕腓力(Philip Wilson Pitcher)著,1911 年出版的 *In and about Amoy: Some Historical and Other Facts Connected with One of the First Open Ports in China*^②(《厦门纵横:一个中国首批开埠城市的史事》,2009 年,何丙仲译),当时在鼓浪屿有三位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人的墓碑:“这些早期贸易商仅在鼓浪屿标志着他们长眠之地的墓碑上留下记载。最近(1905 年)这些坟墓被迁移到‘洋人公墓’。他们墓碑上的日期为 1698 年、1700 年和 1710 年。哪怕从传说中也找不到英国商馆所在地的任何痕迹。”^③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英国在厦门的活动限于贸易活动,对当地文化发展没有任何影响。在鼓浪屿上出现的语言交流过程源自 19 世纪前半叶的东南亚西方殖民地。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第一批海港的大门,清朝海禁政策下外国人来华传教都有很多障碍。然而,到了 19 世纪前半叶西方殖民国家在东南亚的扩张已经有较大成功,马六甲、新加坡、槟榔屿、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处于西方殖民统治下,因此在该地区传教没有受到像在中国的障碍。东南亚的这些重要海港从 17 世纪开始(随着郑成功家族在南洋贸易影响的增大),就具有大量的闽南籍华侨。西方传教士们到了东南亚殖民地的时候发现,为了传教的成功有必要学好闽南话。因而,最早编辑的几部英文闽南话字典中,闽南白话字的一些变体是 19 世纪前半叶在东南亚殖民地上的西方传教士和本地闽南籍华侨交流的结果。

1863 年在鼓浪屿传教的英国伦敦会的麦高温(John Macgowan, 1835—1922, 亦译为麦嘉湖、麦嘉温)于 1889 年出版的 *Christ or Confucius, Which? Or the Story of the Amoy Mission*^④ 这样描写鼓浪屿上传教活动与 19 世纪前半叶东南亚传教活动的关系:“这一时期,由于中国没有传教的空间,传教工作就在巴达维亚、马六甲、槟榔屿和新加坡进行,这里有很多华人定居。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传教士们在这里接受培训,学习汉语,了解华人生

① 何丙仲.鼓浪屿公共租界[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56-67.

② Pitcher, Philip Wilson. In and about Amoy: Some historical and other facts connected with one of the first open ports in China [M]. Shanghai: The Methodist Pub., 1912.

③ 毕腓力.厦门纵横:一个中国首批开埠城市的史事[M].何丙仲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33.

④ Macgowan, John. Christ or Confucius, which? Or the story of the Amoy Mission [M].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其中文翻译版为《西方传教士眼中的厦门》,2015)。

活,一旦中国的大门打开,他们就能在第一时间胜任在中国的传教工作。……这样的伟大人物包括马礼逊、米怜^①、麦都思、理雅各^②、约翰·施敦力^③和雒魏林^④,这些名字因与福音在中国的传播相关而流芳百世。”^⑤

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是近代中西语言文化交流的先驱人物。马礼逊在马六甲联系的另外一位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汉学家是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他在英文闽南话语言交流中做出了重要贡献。麦都思 1816 年被派到马六甲以后,除了马来语和中国官话以外还学了多种中国方言,其中得到高度熟练的闽南话口语能力。麦都思编辑的,1832 年在澳门出版的《汉语福建方言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Hok-k'i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是最早系统化的英文闽南话字典。在马六甲、檳城、巴达维亚等东南亚殖民地传教的麦都思于《汉语福建方言字典》的序言里描写闽南话在福建和东南亚殖民地上的情况,指出官话的使用在东南亚华人,甚至(据他所听说的信息)在闽南地区本身非常有限:

作者因为从来没有去过中国,至今很少有机会和华人的上流人士沟通,可是通过和移民到东群岛[论文作者注:马来群岛]的中层和下层阶级的不断交流,他的一致经验就是五百个人里没有人会说官话,也没有人会说超过十个词的官话。在福建去过其他省的,或者被政府机构雇用过的医生、算命师、演员或者警察有可能会讲一点;可是人们大都完全不熟悉官话,只有通过了科举而有就业的指望才去普通学校开始学习官话,和刚学一种新的语言差不多。^⑥

麦都思关于学习官话还是方言的问题指出:“考虑学习汉语的人,如果在所有省份和一般人的口语交流机会不多,或者大多和上层人士、政府官员沟通,那么学习官话就有好处;可是如果交流范围限于某一地区,而且需要和当地普通大众沟通,那么学习当地土话就更有好处。”^⑦至于编辑闽南话字典的原因和出版环境,作者“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只学过官话,但

① 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英国伦敦会传教士,1813 年被派到澳门与马礼逊一起活动,其后在马六甲定居,创立第一份中文近代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并且和马礼逊一起创立英华书院。

② 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著名汉学家,曾任香港英华书院校长。他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四书五经等古代中国经典的人。

③ 约翰·施敦力(John Stronach, 1810—1888),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参与《圣经》的中文翻译工作。

④ 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 1811—1896),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医生。1838 年被派到巴达维亚,1839 年抵达广州。之后到 1861 年在广州、澳门、上海、舟山、北京开设医院,参与布道活动。

⑤ 约翰·麦嘉湖. 西方传教士眼中的厦门[M]. 龙金顺, 许玉军. 译编.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5: 11-13.

⑥ Medhurst, Walter Henry: A dictionary of the Hok-K'i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M]. Macau: East India Company Press, 1832: V-VI. [2017-01-13]. <https://archive.org/details/dictionaryofhokk00medhrich>.

⑦ Medhurst, Walter Henry: A dictionary of the Hok-K'i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M]. Macau: East India Company Press, 1832: VI. [2017-01-13]. <https://archive.org/details/dictionaryofhokk00medhrich>.

是发现马来群岛的移民不懂官话的时候,他在1818年把注意力转向福建方言。1820年一本小字典的手稿完成了,在马六甲印制;1823年本著作篇幅增加并被送到新加坡,在新加坡学院的支持下印行。该学院的委员会资助出版本著作”^①。

这本著作明显地指出了不少外国传教士为了学习闽南话,编辑闽南话字典的主要原因:大部分传教士联系闽南人的时候发现闽南人社区里面官话不被广泛使用,用官话传教不会吸引大众的注意。

按照《汉语福建方言字典》的序言,该字典基于一部1818年出版的所谓“十五音(Sip-gnoe yim)”本地词典。他所参考的书籍应是谢秀岚编辑的基于漳州音的《增注雅俗通十五音》,简称《十五音》,当时在闽南地区最广泛使用的方言韵书。麦都思指出闽南话里面文白异读的重要性,并且借鉴了《十五音》的标志方法(文读用红,白读用黑墨标志的习惯),在《汉语福建方言字典》里面白读是用斜体字写的,文读是用正体字写的。除了在闽南话中存在而在官话中不存在的声音以外,麦都思使用的拼音方案大部分基于马礼逊于《英华字典》中使用的方案:“……因此作者接受了他认为最合适的拼写法,发音大概相似的话大部分使用马礼逊博士所著的官话字典中的正字法;而且为了避免错误和混乱,全书坚持同一的[规范]。”^②

麦都思在序言里面交代了他编辑的字典以漳州音为标准,并且比较准确地介绍了福建省的方言情况:“福建包括十个地区,其中纯正地使用本字典介绍的方言的只有一个,即在厦门港口附近的漳州;和在东方毗连的泉州方言的差别很小;和在对面邻近的广东省潮州方言的差别更大一点,但是上述所有地区的人还能互相理解。对北部诸县市,即汀州和延平,以及东北诸县市,即兴化和福州来说,作者没办法确定。”^③

麦都思虽然了解闽南话只是福建的多种方言之一,可是他把自己编辑的闽南话字典称为《汉语福建方言字典》。该矛盾至今存在,目前英文中常用的“Hokkien”一词来自闽南话里面“福建”的读法(Hok-kiàn),而不是来自闽北、闽东、莆仙等地的方言。最有可能性的解释是,因为从福建移民到东南亚的华人大部分是闽南人,把闽南话称为“福建话”在当地是不会产生误会的。

① Medhurst, Walter Henry: A 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M]. Macau: East India Company Press, 1832: VI. [2017-01-13]. <https://archive.org/details/dictionaryofhokk00medhrich>.

② Medhurst, Walter Henry: A 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M]. Macau: East India Company Press, 1832: VII-VIII. [2017-01-13]. <https://archive.org/details/dictionaryofhokk00medhrich>.

③ Medhurst, Walter Henry: A 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M]. Macau: East India Company Press, 1832: X. [2017-01-13]. <https://archive.org/details/dictionaryofhokk00medhrich>.



图1 麦都思《汉语福建方言字典》首页

2. 鼓浪屿上英美传教活动及其对语言交流的影响

鸦片战争之前除了麦都思编的《汉语福建方言字典》，还有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台约尔 (Samuel Dyer, 1804—1843) 1838 年在马六甲英华书院出版的《福建方言漳州音字典》。^①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打开五个通商口岸，其中包括厦门，而且外国传教会马上开始了在中国的扩展，把大量传教士派遣到中国，从此鼓浪屿成为到达厦门的外国传教士主要定居的地方。首先被派到鼓浪屿的美国传教士雅裨理 (David Abeel, 1804—1846) 和马礼逊有关系。1810 年创立的美部会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对中国传教事业有兴趣，马礼逊萌发了请求美国教会派遣传教士来华的想法，在取得伦敦会的同意后，马礼逊 1827 年 11 月 20 日给美部会写信，正式请求美部会向中国派遣传教士。1830 年 2 月 25 日，美部会派来的第一位传教士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 与当时作为美国水手协会的牧师雅裨理抵达中国，同时回应马礼逊利用出版推动传教事业的

① 马重奇. 海峡西岸闽南方言与文化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230-254.

建议,给广州送来一台印刷机和一套英文铅字。^①

雅裨理 1841 年 8 月到厦门以后,美国归正会的另外一些传教士也来了:甘明医生(Dr. Cumming, 1842—1847 年在厦门)、罗啻(Elihu Doty, 1844—1865 年)、波罗满(William J. Pohlman, 1844—1849 年)、毕德(L. B. Peet, 1846—1847 年),还有约翰·打马字(J. V. N. Talmage, 1847—1892 年)。按照毕腓力于《厦门纵横》中的记录,“在此必须提到的是,先前雅裨理、罗啻和波罗满已在爪哇和婆罗洲住了好几年,等待中国打开紧闭的大门”^②。

英国伦敦会最早派到厦门的一些传教士包括:约翰·施敦力(John Stronach, 1844—1878 年在厦门)、养魏霖(William Young, 1845—1855 年)、亚历山大·施敦力(Alexander Stronach, 1846—1870 年)、海雅各医生(Dr. Hyslop, 1848—1853 年)、夏蜜女士(Miss Harvitt, 1850 年到来)和吉尔菲兰牧师(T. Gilfilan, 又称纪牧师, 1850—1851 年)。毕腓力认为养魏霖特别熟悉闽南话,“养魏霖牧师出生于爪哇。他也在新加坡学了七年的厦门方言。据说他讲的话和本地人一模一样。第一本由 13 篇赞美诗组成的《圣诗》……就是他翻译的”^③。对施敦力来说,“约翰·施敦力牧师来厦之前在新加坡学了七年的厦门话。他的兄弟亚历山大也一样。所以他们一到寮仔后[译者注:闽南话原名为 Liao-a-au, 早期在鼓浪屿建设的教堂的位置]就能开始布道”^④。

英国长老会早期派出的传教士包括:用雅各医生(Dr. Jas. Young, 1850—1865 年在厦门)、宾为霖(William C. Burns, 1851—1854 年)、仁信牧师(J. Johnston, 1853—1855 年)、杜嘉德博士(Dr. Carstairs Douglas, 1855—1877 年)。其中杜嘉德对语言交流和闽南白话字传播的贡献特别大,“传教士们应该对杜嘉德那本《厦英大辞典》(*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感激不尽,每个住在本地,或者海峡那边,或者海峡殖民地的人能够有幸得到一本,都会很高兴”^⑤。可见,杜嘉德编辑的《厦英大辞典》除了闽南地区以外,还传播到了台湾和马来半岛的闽南籍华侨社区。

教会联盟的三个教会(美国归正会、英国伦敦会、英国长老会)是岛上最有影响力的,可是除了它们以外还有另外一些教会。美国安息日会在鼓浪屿上于 1905 年开展传教工作,同时创办“育粹小学”,后来改名为美华小学。该教会“在其厦门站和两个外站(王坑和泉州)布道,总共有 42 个人被接纳为教会团契。它们开办了三所学校,有 62 名在校学生,聘用了 4 位本地福音传教士、4 名贩卖《圣经》的小贩和 3 位学校教师”^⑥。美国圣公会的最早代表者

① 李宇明,张西平.19 世纪汉英词典传统——马礼逊、卫三畏、翟理斯汉英词典的谱系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71-172.

② 毕腓力.厦门纵横:一个中国首批开埠城市的史事[M].何丙仲,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149.

③ 毕腓力.厦门纵横:一个中国首批开埠城市的史事[M].何丙仲,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149.

④ 毕腓力.厦门纵横:一个中国首批开埠城市的史事[M].何丙仲,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149.

⑤ 毕腓力.厦门纵横:一个中国首批开埠城市的史事[M].何丙仲,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153.

⑥ 毕腓力.厦门纵横:一个中国首批开埠城市的史事[M].何丙仲,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154.

文惠廉(William J. Boone)和雅裨理同时到了鼓浪屿,可是两年之后离开了厦门,被调到上海继续传教,此后美国圣公会没有继续在鼓浪屿上进行传教活动。文惠廉的妻子在鼓浪屿上逝世,她的遗体安息在鼓浪屿洋人公墓。^① 美国长老会早期派到鼓浪屿的传教士包括布恩牧师(T. L. McBride, 1842年6—12月在厦门)、合文医生(Dr. Hepburn, 1843—1845年)、卢一牧师(John Lloyd, 1844—1848年)和不鲁文牧师(A. Brown, 1845—1847年)。其中“卢一牧师在靠近斗美路头(汇丰银行附近)那里租了房子开始布道,并对其《厦门语字汇》投入大量的工作,这部字典为杜嘉德博士能够以熟练的技巧完成他那部优秀作品打下基础。因为后继无人,美国长老会就向北方和南方转移”^②。毕腓力还提到天主教会在鼓浪屿上的存在,可是没有详细地介绍该教会在岛上的活动。^③

可见,大多抵达鼓浪屿的传教士之前在东南亚闽南籍华侨社区中学好了闽南话,得到了传教经验,因此鼓浪屿上的语言文化交流实际上可以看作在东南亚殖民地上外国传教士和本地闽南籍华侨的交流的一种继续。

3. 鼓浪屿上编辑的闽南话课本及字典与闽南白话字的发展

在鼓浪屿上编辑课本和字典的外国传教士以及他们的著作名单如下:

(1) Dr. John van Nest Talmage(打马字):《唐话番字初学》(1852年在厦门出版,闽南话原名为 *Tûg-oē Hoan-jī Chho'-hak*);《厦门音字典》(原名为 *E-mûg-im ê Jī-tián*, 1894年在厦门出版)。

(2) Elihu Doty(罗啻): *Anglo-Chinese Manual of the Amoy Vernacular*《中英厦门方言手册》(1853年在广州出版)。

(3) John Magowan(麦高温): *A Manual of the Amoy Colloquial*《英华口才集》, 1869年在香港出版);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Amoy Dialect*《厦英大辞典》, 1883年在伦敦出版)。

(4) Carstairs Douglas(杜嘉德):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厦门音汉英大辞典》, 1873年在伦敦出版)。

打马字对闽南话白话字的系统化和传播做出的贡献特别大。但被称为“白话字之父”的打马字并不是一个人创造了这个拼音方案:白话字是打马字、罗啻等其他一些当时在鼓浪屿上工作的外国传教士的合作结果。但打马字无疑是最早的教授白话字拼音方案的手册《唐话番字初学》的编辑。打马字的工作成果于1894年(他逝世之后第二年)被收集在《厦门音字典》中,并得以出版。其序言说:

Chit pún Jī-tián sī Tâi Bí kok Kuì-chèng Kàu ê Bo'k- sū Táⁿ-má-jī Sian-siⁿ choè.

① 毕腓力. 厦门纵横: 一个中国首批开埠城市的史事[M]. 何丙仲, 译.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9: 152.

② 毕腓力. 厦门纵横: 一个中国首批开埠城市的史事[M]. 何丙仲, 译.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9: 153-154.

③ 各教会早期派遣的牧师的名录和时间参考: 毕腓力. 厦门纵横: 一个中国首批开埠城市的史事[M]. 何丙仲, 译.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9: 149-155.